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

鲁才全

《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府君(备)墓铭并序》,署名为“再从兄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瑄撰”,“弟孤子储书”。志石现藏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此志载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图版编号1077,该书编者于图版说明中定为“会昌元年(841年)八月”;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1册81页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172页均载录此志,也分别注明为“唐会昌元年(841年)八月葬”。《唐代墓志彙编》载有此志录文,编为“会昌004”号,显见亦视为会昌元年墓志。然而,这种认定和编排都是错误的。其所以说是错误的,是因为孙备墓志并未提供会昌元年的明确纪年,从中也查找不出可以定为该年的任何根据。错误之所以发生,或许是导源于提供拓本的墨景堂。经查,在墨景堂孙备墓志拓本的封套题签上确实写有“孙瑄撰,子储书,会昌元年八月一日”字样。封套题签上不仅将纪年写作“会昌元年八月”,并在“八月”下随意加入“一日”二字,而且将“弟孤子储书”写为“子储书”。对于日期的添加和书丹者身份的显然错误,上列诸书均未采取,但纪年的错误却被沿袭下来。

既然会昌元年有误,那末,孙备墓志的正确纪年究竟是何年?今据孙备墓志并结合其父《孙景商墓志》、其妻于氏墓志以及有关文献资料试为考辨。

《孙景商墓志》著录于《唐代墓志彙编》,编号为大中120,系据周绍良藏拓本录文。志题“唐故天平军节度郢曹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朝请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郢州诸军事兼郢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兵部尚书孙府君墓志铭并序”,署名为“翰林学士承旨通议大夫户部侍郎知制诰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蒋伸撰”,“长子备书”。

景商志云:“年六十四,以大中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薨于镇”,“即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祔先茔,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杜郭村”;又云:“有子七人:曰备、曰侑、曰伉、曰俊、曰伾,皆于之出也;小男曰俨、曰攸,并专谨力学。备有文,已二举进士;伉,右千牛备身;伾,仆寺进马”。据此,大中十年(856年)孙景商卒时,孙备尚在致力于进士举业,未曾入仕,故为其父墓志书丹,仅具长子身份。

孙备妻于氏志载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图版编号1164,乃孙备撰。原志无题,该书编者据志文内容拟题为《唐乡贡进士孙备夫人于氏墓志铭》。

于氏志云:“夫人于氏,河南人也。……父讳珪……妣弘农杨氏夫人……外姑幼与太夫人为中表善,始抚腹期为二亲家。”“大中七年,年十八,余冠有二岁,先君率太夫人征金陵舅如约,故余与金陵二世于外氏重姻”。又云:“以咸通六年二月八日终于上都永乐私第,享年

卅”。“咸通六年五月十六日,乡贡进士孙备铭其妻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邙山杜翟村大茔”。据上引于氏志文可知:一、当于氏尚在母腹之中时,其母杨氏因与孙备母于氏(按:详见孙景商志)为中表亲,又相友善,故指腹为婚,以期结为亲家。至大中七年(853年),于氏年方十八,孙备二十有二,遂如约成婚。二、于氏卒于咸通六年(865年),享年三十。其时孙备以“乡贡进士”身份为亡妻撰写墓志铭,依据大中七年结婚时的年龄来推算,当为三十四岁。只是仍未达成举业,步入仕途,其健在在世,自不待言。

以上考察表明,孙备卒葬年代断非会昌元年,而只能是在咸通六年其妻于氏卒后。究系何年,则应据孙备志提供的线索详加考察。

孙备志为“再从兄”孙璵撰。孙璵,两《唐书》中无传,仅有点滴事迹可见。《新唐书》卷73《宰相世系表》武邑孙氏载“璵字子泽,凤翔少尹”^①。据表,知璵为孙公义子、孙会孙、孙遥曾孙、孙嘉之玄孙;孙备为孙景商子、孙起孙、孙遵曾孙、孙嘉之玄孙。孙璵与孙备未出五服,确为再从兄弟。考《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咸通十一年九月,“正议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孙璵为汀州刺史;……并坐刘瞻亲善,为韦保衡所逐也”^②。此事《资治通鉴》卷252咸通十一年九月条记作“御史中丞孙璵坐为(刘)瞻所引用,亦贬汀州刺史。”据上引资料可知,孙璵因与刘瞻关系亲善,受其连累,自御史中丞贬出为汀州刺史,事在咸通十一年九月。联系其为孙备撰志时所具衔名看来,则其撰志之时尚在御史中丞任上无疑。由此,似可推断孙备卒葬年代的下限当在咸通十一年。

孙备志云:“累昇歌于春官氏,连战连北,每黜归,必愉愉而喜,以解太夫人之愠。今赵华州主宗伯,挹君而喜曰:我得俊矣,果书君于籍中”。孙备进士举多年,屡战不捷。其父孙景商志云:“备有文,已二举进士。”表明至大中十年已两举未第。又孙备为其妻于氏所撰志云:“果不才,一纪八黜于小宗伯矣。二年垂成,为中外反挤而贡所匿者。夫人恚泣成疾……未浹旬,以咸通六年二月八日终于上都永乐私第”。这表明至咸通六年为止,孙备已八次应进士举,均告落第。其妻为此积郁成疾,以致早逝。故孙备在志文中对亡妻的歉疚之意溢于言表。而在孙备志中,孙璵更记述了备每次落第还家,必须强作笑颜,以解高堂老母愠怒的苦涩心态。虽说孙备运乖时蹇,屡举不中,苦熬了许多年头,但终于时来运转,得遂所愿。志文所谓“今赵华州主宗伯”者,即赵鹭。赵鹭,两《唐书》中有传。《旧唐书》卷178《赵隐附弟鹭传》云:“亦以进士登第。大中末,与兄隐并践省阁。咸通初,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六年,权知贡举。七年,选士,多得名流,拜礼部侍郎、御史中丞,累迁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卒”。又《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载:“(咸通六年)九月,以中书舍人赵鹭权知礼部贡举;以吏部侍郎萧倣检校礼部尚书”。由此,知赵鹭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时在咸通六年九月。而七年,选士多得名流,方拜礼部侍郎。据徐松《登科记考》卷23载:咸通七年(丙戌)“知贡举,礼部侍郎赵鹭”。该年选取以韩衮为状元的进士二十五人^③。依孙备志,赵鹭在主宗伯时“挹君而喜曰:我得俊矣,果书君于籍中”。则孙备于咸通七年被取中,名列当年进士及第的二十五人之中,应属无疑。至于赵鹭何时累迁华州刺史,不详。据《旧唐书》本传,咸通七年拜礼部侍郎后,还有御史中丞一任,则其刺华州必在七年之后。又据孙备志有“今华州”之语,显见孙备卒年赵鹭仍在华州刺史任上。

孙备志又云:“大司马王公领事盐铁,署君巡官,假校书郎”。志所谓“大司马王公领事盐铁”者^④,实指王铎。王铎,两《唐书》中有传。《旧唐书》卷164《王铎传》载铎历官较详,然未及其任兵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使。关于王铎自咸通四年十一月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以

后的官职迁转，严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一书考述甚详。兹摘引两条结论如下：

咸通七年，由吏侍转户侍、判度支^⑤。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三日辛亥，由兵尚、诸道盐铁转运使迁礼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⑥。

据上引两条严耕望先生的结论表明，王铎自咸通七年（866年）转户部侍郎、判度支，至十一年（870年）十一月三日由兵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使迁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间不仅管理财政几达五年之久，而且确曾任过兵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使。这与孙备志所云“大司马王公领事盐铁”正相符合。由此可见，王铎署孙备为巡官。假校书郎必在咸通十一年之前。具体而言，很有可能就在孙备于咸通七年春进士及第后不久。

孙备志又云：“间一岁，丞相司徒谯郡公奏直弘文馆，得渭南尉，……君以太夫人志客洛下，远荣养而利禄仕，非素心也，请弃职而东。丞相重违之，即授洛阳尉以适君之私，非公举也”。志所谓“丞相司徒谯郡公”，即夏侯孜。夏侯孜，两《唐书》中有传。《新唐书》卷63《宰相表下》载其咸通年间历官较详。又《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咸通十年（869年）正月有云：“以河中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平章事、上柱国、谯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夏侯孜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时南平蛮寇西川。责孜在蜀日失政也”。据上引史料，夏侯孜确实任过宰相、检校司徒、且封爵谯郡开国公，与孙备志所云“丞相司徒谯郡公”相合。由此可进而认为：当孙备被王铎署为巡官、假校书郎后约年余，又为夏侯孜“奏直弘文馆，得渭南尉”。只是由于孙备以不便奉养居住于洛阳的老母为辞，请弃职而东，故不久即授洛阳县尉，满足了他的私愿。从孙备志的前后行文结合夏侯孜的历官推断，其时或即咸通八、九年。

孙备志又云：“君……知季舅丞相雅重之不与诸甥等。丞相居中书四年，天下事在手，而君未尝以时事挂牙齿，且曰：我终不以私害吾舅之美。退居恬如也。其全道守节多如此。”志所谓“季舅丞相”，即懿宗宰相于琮，乃孙备岳父于珪之季弟。于琮，两《唐书》中有传，《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载其咸通年间的官历迁转较详。据《懿宗纪》可知，于琮自咸通八年以兵部侍郎入相，至十三年罢相为普王傅、分司东都。其间，自咸通八年十月任中书侍郎起，至咸通十一年末或十二年迁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止^⑦，于琮在中书侍郎任上计有四年或五个年头。若依四年计，适与孙备志所云“丞相居中书四年”相合。一般说来，墓志对志主生平的记述只到其卒年为止。由此推知，于琮居中书之第四年即为孙备卒年。换言之，孙备卒于咸通十一年。

我们推证孙备卒于咸通十一年，绝非武断臆说，亦非孤证。若就孙备墓志进一步考察，还可得到两重直接证明。

孙备墓志云：“卒年三十九”。前述孙备为其亡妻于氏所撰墓志载明：“大中七年，年十八，余冠有二岁”，这是二人结婚时各自的年龄。据此顺推，至孙备三十九岁卒时，适为咸通十一年。此为一重直接证明。

孙备墓志又云：“今天子受英武至仁号之年，夏五月，洛阳县尉孙君备以疾亡于官。秋八月，卜窆于河南县平洛乡杜翟村，祔先公之墓”。写于志文开头的这段文字已将孙备的卒葬年月作了交待。只是撰志者孙邈在纪年上玩了一个变通的花样，致使人们不能一望而知，还得费一点翻检置换的工夫。其实，“今天子”是指懿宗，“英武至仁”乃是群臣给懿宗所上尊号的省称。这一尊号上于何年，诸书记载不一。现分列如下，再行判定。

《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咸通）十二年春正月戊申，宰相路岩率文武百僚上徽

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御含无殿,册礼毕,大赦。”

《唐会要》卷2《帝号下》:“咸通十二年辛卯正月,再上尊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

《册府元龟》卷12帝王部·尊号二载:“咸通十二年正月戊申,宰臣路岩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御含元殿受册”。

《新唐书》卷9《懿宗纪》:“(咸通)十一年正月甲寅,群臣上尊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大赦”。

《资治通鉴》卷252懿宗咸通十一年载:“春,正月,甲寅朔,群臣上尊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

上列诸书所记同为一事,而年代有异:一作咸通十二年,一作咸通十一年。究竟何者为是?我以为《新唐书》、《资治通鉴》二书所记为是,余者为非。作此判定的理由是基于孙瑄的官职及其任官处所。孙瑄为孙备撰志时具衔为“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其时居官必在京师长安。且志文云“葬有日,府君之太夫人以书走八百里告于犹子瑄曰”,亦以约数表明了洛阳至长安的距离^⑥。又前文已述孙瑄因坐与刘瞻亲善,于咸通十一年九月由御史中丞被贬出为汀州刺史。因此,其在未贬之时于八月孙备安葬之前为孙备撰写墓志,称“今天子受英武至仁号之年”断然只能是咸通十一年,而决不会是咸通十二年。此为第二重直接证明。

综合以上考察,结论是:孙备墓志的镌立年代应是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而决非沿误已久的武宗会昌元年(841年)。这里还要顺便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于孙备一栏中记作“备字礼用,直弘文馆、兰田尉”。据志,孙备未曾为兰田尉,而是历渭南尉,终官洛阳尉。此可正《新表》讹误,补其阙失。

[附记:碑刻墓志可补文献史料之不足,二者结合,有助于史学研究。遵从唐师教诲,学生正从事此项工作,谨撰此小文,以为祭奠。]

注 释:

- ① 孙瑄墓志载录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四册第155页,志题“唐故御史中丞汀州刺史孙公墓志铭并序”。罗振玉写有《汀州刺史孙瑄墓志跋》,文载《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一册第249—251页。跋文称:“瑄,凤翔少尹。据志则瑄官至御史中丞,出为汀州刺史,未尝为凤翔少尹也”。罗先生所见极是,跋文指明了《新表》的讹误。
- ② 《旧纪》“正议大夫”疑为“朝散大夫”之误。按正议大夫为正四品上阶、朝散大夫为从五品下阶文散官,御史中丞为职事官从五品上。孙瑄为孙备撰志时具衔“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因职事官品高于散官阶品,故宜用“守”字。
- ③ 赵守俨点校本《登科记考》,第851—853页。
- ④ “大司马”在唐代常用为兵部尚书的代称。
- ⑤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12第739页、卷13第777页。
- ⑥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14第809页、卷17第924页。
- ⑦ 于琮迁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的时间,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第73页及第387页。
- ⑧ 《元和郡县志》卷1关内道一京兆府载:“东至东都八百三十五里”,同书卷5河南道一河南府载:“西至上都八百五十里”。二者微异。孙备志记作“八百里”,当是取的整数。

(责任编辑 吴友法)